

篆字讀碑書系

善本碑帖论稿



施安昌 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乾隆与石鼓文

北凉体书迹叙录——兼谈铭石书与写经书

关于唐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拓（明李祺旧藏本）

浙江图书馆藏宋刻《淳化阁帖》石考

对6世纪前后中国祆教艺术图像的认识

俗祆教徒上层葬礼仿效华俗

关于祆教文物及其艺术的系统之思考

摩尼七神像石刻拓本考略

小蓬莱阁与欧斋

篆字讀碑書系

善本碑帖论稿

施安昌

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善本碑帖论稿 / 施安昌著. -- 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79-1381-9

I. ①善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碑帖-鉴定-中国-古代-文集 IV. ①K877.42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9334号

善本碑帖论稿

施安昌 著

责任编辑	冯磊	崔悠笛
审读	沈培方	
责任校对	郭晓霞	
封面设计	王峰	
技术编辑	钱勤毅	

出版发行	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● 上海书画出版社
地址	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
网址	www.ewen.co www.shshuhua.com
E-mail	shcp@163.com
印刷	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	各地新华书店
开本	787×1092 1/18
印张	19.56
版次	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79-1381-9

定价 98.00元

若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

目 录

关于石鼓文

乾隆与石鼓文 / 3

两种乾隆时期拓的石鼓文 / 19

著录两本元明间的石鼓文拓本 / 30

碑刻考订

书明拓《张迁碑》（朱翼盒旧藏本）后 / 39

北凉体书迹叙录——兼谈铭石书与写经书 / 50

关于唐《九成宫醴泉铭》碑拓（明李祺旧藏本） / 59

《淳化阁帖》研究

清朝内府藏《淳化阁帖》 / 71

浙江图书馆藏宋刻《淳化阁帖》石考 / 81

《淳化阁帖》懋勤殿本、潘祖纯本和浙江图书馆藏《阁帖》相关资料辑注 / 95

碑帖刻石与早期拓本的发现及其相互佐证 / 106

宋拓《淳化阁帖》卷四与《绛帖》后七、八卷校后记 / 114

刻帖辩证

宋刻《汝帖》与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（翁方纲旧藏） / 123

故宫藏《绛帖》二十卷（吴荣光旧藏）内的批注与考证浮签 / 135

《兰亭序》晋唐文献八篇 / 148

文献与刻帖所见的《出师颂》 / 160

《星凤楼帖》十二卷本再研究 / 168

石刻所见古代宗教

- 北齐吴莲花法义三十八人造像考 / 181
对6世纪前后中国祆教艺术图像的认识 / 195
祆教徒上层葬礼仿效华俗 / 203
关于祆教文物及其艺术的系统之思考 / 214
摩尼七神像石刻拓本考略 / 222
为祖母吕氏敬造神像题记拓本——对古器物局部拓本的研究 / 234
北齐静明等修塔造像石刻探讨 / 245

故宫珍品全集碑帖卷导言

- 延禧宫碑话 / 261
延禧宫帖话 / 271
名碑十品 墨林星凤 / 281

其他

- 关于马衡先生的日记 / 289
关于《马衡诗钞》 / 295
追思凡将斋 / 297
朱翼鑫先生的碑帖收藏——《欧斋石墨题跋》前言 / 304
读《欧斋石墨题跋》 / 308
小蓬莱阁与欧斋 / 311
黄易，一位值得纪念，有待研究的金石考古家 / 317
马子云先生学术经历片断的回顾 / 323
故宫新收骨化石铭刻（楔形文字）的情况 / 335
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和《集古录目》 / 340

后记

关于石鼓文

乾隆与石鼓文

在2010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“珍秘翰墨——清宫藏善本碑帖特展”上有一件乾隆十四年己巳（1749）拓的石鼓文拓本（图1）。就存字多少而言当然是在年代更早的拓本之下（今还有宋明拓本传世），以往无缘展出，但就其历史价值而言有其他所不能相比之处。

石鼓为十块圆柱形巨石，每石高90厘米，直径67厘米（唯《作原》一鼓被凿去一截作臼），形状若鼓（图2、图3）。每石用大篆体刻四言诗一首，典雅、高古。其中《吾车》一首诗句与《诗经·小雅》中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两首文句有相同，又有“天子永宁”、“公谓天子”等句。诗的内容记叙君王与贵族游猎，所以也称《猎碣》。关于它的制作年代，历来诸说不一。唐初出土于天兴县（今陕西凤翔），自韦应物、韩愈作《石鼓歌》（见本文附录一）以称颂，而后显于世。经五代之乱曾散佚，宋代郑余庆迁凤翔府夫子庙。宋司马池复輦置府学之门庑下。宋大观（1107—1110）中自凤翔迁于汴京（今开封）辟雍，后入保和殿。金人破宋（1127），輦归燕京（今北京）国子监。历元、明、清至民国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将石鼓迁藏四川。1951年再回北京，入藏故宫博物院至今。



图1：乾隆十四年拓石鼓文之一《吾车》

乾隆八年癸亥（1743），弘历三十三岁，他命张照、梁诗正等将内府藏书画精品加以著录，编成《秘殿珠林》和《石渠宝笈》初编，前者为佛、道教艺术品。

乾隆十二年丁卯（1747），又谕选内府所藏法书刻成《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》。

乾隆十四年己巳（1749），弘历三十九岁，他对历史更为悠久、文字深奥的先秦石鼓产生了兴趣。石鼓陈列于国子监，元人潘迪撰写的《石鼓音训碑》和石鼓放在一起。弘历拓得石鼓文一份，参照“音训”，研读铭文。在每个字右边粘上一明黄纸签，标写出释文，便于以后反复诵读，还制作了一只精雕细刻的木匣来装入拓片。他作了一首诗叫《石鼓歌》，称石鼓是“千秋法物”¹，然后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奉和一首，再把诗刻到木匣上（见附录二）（图4）。从此，这套石鼓拓片就一直供奉在乾清宫里，这里为皇帝听政的地方。

这年十一月，敕令梁诗正、蒋溥等对内府庋藏之鼎彝铜器绘图、著录、释文，编为《西清古鉴》。铜器与石鼓同属商周古物，弘历从石鼓文得到启示而决定整理内府藏器。“以游艺之余功，寄鉴古之远思，亦足称升平雅尚。”（《西清古鉴》上谕）透露出同样的思想。

乾隆于文史和艺术本博学多能，涉足石鼓也不奇怪。然而这件事做得如此郑重其事，而且在许久以后的诗文里还一再回忆起来，那自然是另有深意的了。试从他和侍臣以及韩愈的诗里分析。因原诗都长，这里仅作摘录。



图2：石鼓之一《鼃车》



图3：石鼓之一《田车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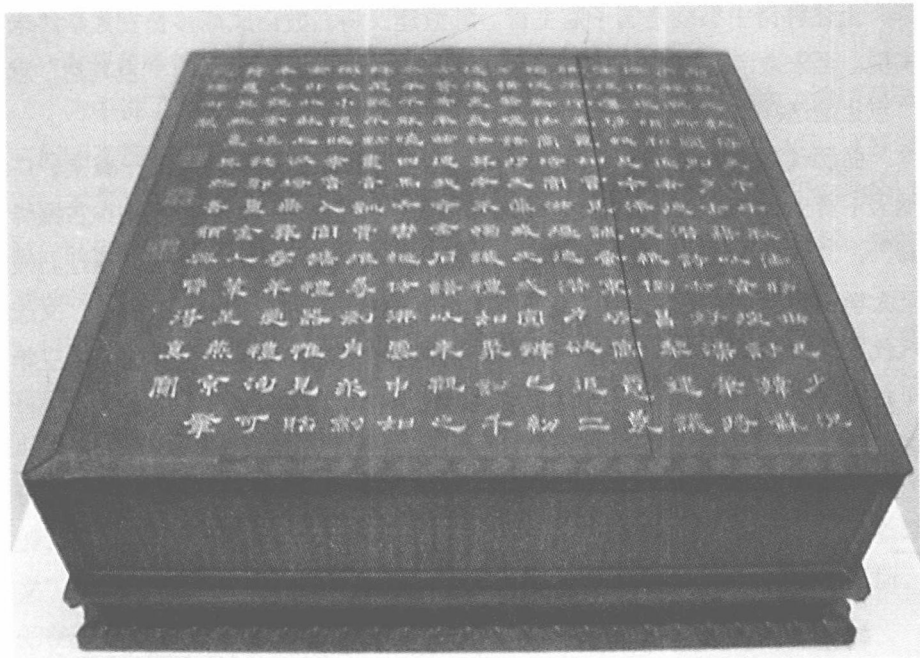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：乾隆十四年石鼓文拓本木匣

韩愈《石鼓歌》（摘）：

张生手持石鼓文，劝我试作石鼓歌。

少陵无人谪仙死，才薄将奈石鼓何。（中略）

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宝存岂多。（中略）

圣恩若许留太学，诸生讲解得切磋。²

弘历《石鼓歌》（摘）：

石鼓之数符天千，千秋法物世已少。（中略）

况乎辟雍所罗列，多士藉以资探讨。（中略）

昌黎建议虽不行，至竟如言见诚蚤。

韩意其然岂其然，吾愿兴贤得真宝。

蒋溥诗（摘）：

圣人真宝怀兴贤，考文亦冠籀篆篇。

我皇武功廓八埏，撰刻不籍猎碣传。

介福诗（摘）：

不惟其物惟其意，中兴伟烈尊周宣。

我皇揽古振异彩，牟尼珠耀萦回旋。

上述韩诗中祭酒是国子监主管。韩愈建议将石鼓自凤翔移长安太学终未实现。至宋徽宗时方移入汴京辟雍。弘历诗中“蚤”通“早”。“岂其然”意“岂止是这样”。

弘历《石鼓歌》表示“吾愿兴贤得真宝”，即借助于石鼓这一真宝，广纳天下贤士，鼓励“稽古右文”的风气。而臣子诗意更明朗：“我皇揽古振异彩”，“中兴伟烈尊周宣”。很明显，弘历《石鼓歌》主旨在于对韩愈迁石鼓至太学正确建议的赞许，并由此获得“吾愿兴贤得真宝”的启示。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（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），早在乾隆三年（1738）弘历就敕封韩愈三十四代孙韩法祖为翰林院五经博士，其后代子孙世袭其位。

二

乾隆三十七年壬辰（1772）上谕为修纂《四库全书》向各地征书，后又开四库馆。

乾隆四十八年癸卯（1783）仲春，弘历七十三岁，内府得到石鼓的元代拓本十叶，这在当时是石鼓文最早的拓本了。后面还附赵孟頫写的音释，抄录了唐张怀瓘赞语，韩愈、韦应物诗，宋苏轼、周越诗文，元代周伯琦、顾文昭、卢原质、孙经、唐志淳、危素的题跋与诗共六叶。弘历将元拓本与十四年拓本放在一起，每个鼓逐行逐字校对，并写下校碑记录。如“乾隆己巳年摹拓石鼓文。第一鼓即元拓本第八鼓，第三行多‘鹿’字，第六行多‘避’字，共多二字（下略）”。发现元拓本存三百五十六字，十四年拓本存三百一十字，已少四十六字。（据《石渠宝笈续编》“元拓石鼓文”条，第561页）弘历在元拓本前写了“籀文神护”四字，于拓本后题七言一首：

己巳拓藏石鼓辞，及存真迹弃珍之。

讶观元代赵家印，重读唐时韩氏诗。

居上后来宁避谗，为雄积健信称奇。

收三百又加旬者，多四十还余六兹。

节化智营二以外，文乎宣也古惟斯。

商彝夏鼎方伯仲，片羽吉光永陆离。

龙爪云中幻隐现，蚪文劫后尚留遗。

渊明甚解不求处，向辟其言用此宜。

癸卯仲春御题。³

诗中讲了校碑结果和韩愈诗的重要，指出石鼓是周宣王时物。诗结尾云“渊明甚解不求处，向辟其言用此宜。”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说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是说对所读的书不执着于字句的讲解。弘历借陶渊明话说出石鼓的难读难解，还说出了对石鼓的难以释怀，意味着他与石鼓的对话仍会继续下去。

随从皇帝观碑的侍从有八位，即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植、金士松、赵秉冲，也都恭作诗跋。如刘墉诗（摘）：“岐阳石鼓，传二千年。依于宫墙，至今存焉。文或不蚀，其光煜然。夙登内府，如星在躔。帝庸作歌，岁唯己巳。谓兹法物，上征姬氏。兴贤为宝，训垂万祀。神护不毁，以彰古义。皇情眷之，见道于器。”（见《石渠宝笈续编》“元拓石鼓文”条，第562页）这件元拓本石鼓早已遗失，如今故宫保存着一件碧玉册，即癸卯御题诗。

三

乾隆五十四年己酉（1789）八月，弘历七十九岁，他再度关注石鼓文。关于石鼓刻石的时代，以往有几种说法：韦应物、韩愈、欧阳修以为周宣王时（公元前827—公元前782），董道、程大昌以为周成王时（公元前1042—公元前1021），郑樵以为春秋战国之秦国（公元前770—公元前221），陆发仁以为北魏宣武帝时（502），马定国以为西魏北周宇文氏时（535—581），等等。弘历则赞成周宣王时刻。⁴关于十个鼓的排序历来也有分歧，弘历则主张以潘迪《石鼓音训》顺序为准。

同年十一、十二月弘历做了三件事：其一，按照潘迪的排序，调整了元拓石鼓文的前后次序。他摘韦应物《石鼓歌》内“喘息逶迤相纠缠，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”十六字，分别写在十六叶之首以辨次第。其二，弘历为元拓本题诗并跋（见附录三），与元拓本一起重新装裱，并把癸卯年写下校碑记录和和珅、刘墉八人跋与诗，也裱入册。其三，筹备重刻石鼓事宜，命赵秉冲为新石鼓写篆文。（赵秉冲篆文见弘历写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。）赵秉冲，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钦赐举人，官户部右侍郎，书法四体皆精。

四

乾隆五十五年庚戌（1790），弘历八十岁。

正月十日，进呈王澐（1668—1743）于雍正八年（1730）所临《石鼓文》。王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，官吏部员外郎。同时进呈汪由敦（1692—1758）乾隆四年（1739）所临《石鼓文》。汪是雍正二年进士，官至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这两件作品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正月十五日，弘历颁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，制鼓重刻序》，该序墨迹今存故宫（图5、图6、图7）。这篇序文有千余字，是弘历有关石鼓文字最长的一篇。分五层意思：

（一）编四库全书和满文译大藏经两件大事虽然举事已晚（在六十岁以后），但现在终于成功了。

（二）今石鼓已漫漶，存不及半，将来终归毁灭。有治世之责的君王，如果视之而弗救，那就不是读书人了。我在耄耋智昏之前，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。

（三）韩愈讲石鼓是西周宣王时所刻，因为鼓文与《诗经·小雅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两首可以印证。他又认为石鼓宜置国学，成为万世读书人治学的门径。这些都正确，但是他还未考虑到将石鼓永远保存下去的事。

（四）现在用石鼓所存310字，依照原来诗意，重编鼓文十章（弘历亲编首章与末章，其他八章由彭元瑞作），命赵秉冲篆书镌刻于新鼓之鼓面。如此可以仍然保留周宣王之文，成十鼓之全，又非拘于形而泥于古。

（五）旧鼓旧文为千古重器，不可轻动，但置木栅，蔽其风雨，珍重护惜，以永万世。

（六）新鼓与旧鼓并列国子监以公天下，惠后儒。热河文庙为岁岁惠远诘武之地，则亦命置之；以诏来世，使宣王中兴之烈不泯，宣圣牖世之道恒昭。（见附录四之一）这篇序文不仅综括了弘历对石鼓的考证，阐述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思想，还确定了保护复制和安置石鼓的办法。

正月十六日，乾隆题《再题石鼓》（见附录四之二），这首诗涉及石鼓中《作原》一鼓的沿革。该鼓在很早的时候被人凿去了一截，当中凹陷下去成



图5: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,制鼓重刻序》引首题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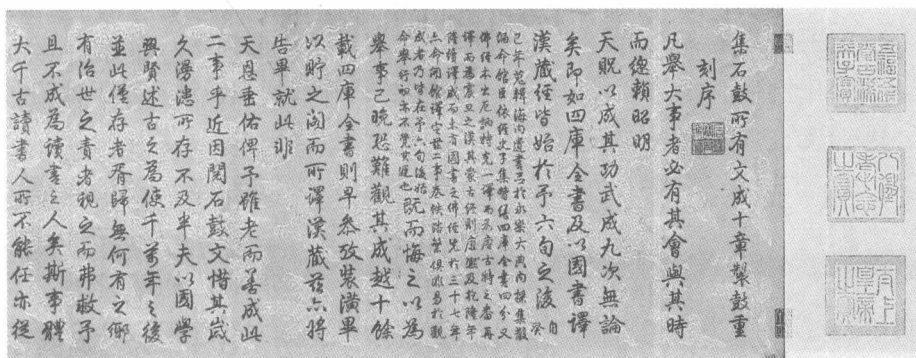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: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,制鼓重刻序》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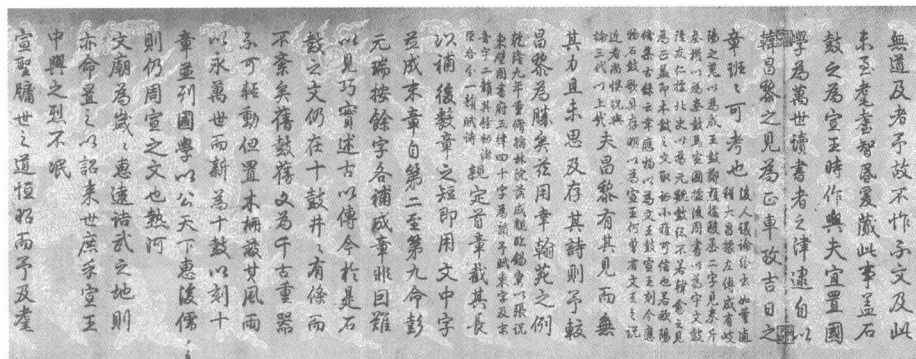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7: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,制鼓重刻序》之二

了春米的石臼。有一种说法,认为宋代司马池将石鼓从田野移到凤翔府学,当时《作原》鼓的原石已遗失。皇祐四年(1052)向传师留心寻访,才在附近乡间找到,但已为人改凿成臼。也就是说《作原》一鼓在唐代发现时尚完整,后来遗失之后被凿成臼。弘历根据韩愈《石鼓歌》中已有“为我度量掘臼科”的话,认为《作原》鼓在唐代已成为春米用的石臼,而不是当散失之后才改凿为

石臼的。弘历又把自己的诗文《再题石鼓》书丹于《作原》鼓的口沿上并让人刻出来。

正月中旬，乾隆题《重排石鼓诗得句》（见附录四之三）。

二月，呈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。乾隆诗题《观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作歌》（见附录五）。张照（1691—1745），康熙四十八年进士，官吏部尚书，也是弘历的老师。

五月，重刻石鼓功毕，一式二套。一套仍置国子监大成门下（图8、图9），另一套置热河避暑山庄文庙。同时将乾隆的制鼓重刻序与张照书韩愈石鼓歌分别刻作两碑，树立在石鼓旁边，以示典重，晓天下。

与此同时还为原刻石鼓增设屋檐和栅栏以蔽风雨，防损坏。

五月十六日（丙申），“上诣热河文庙行礼，阅视新镌石鼓于戟门”（见《清高宗实录》）。

乾隆五十六年辛亥（1791），弘历着手布置重刻儒家经典十三经。此事到五十九年（1794）完成，一百九十块石碑立于国子监直至今日。弘历在十三经序中说：“石鼓不过周宣王之事，列于文庙之门，以寓兴文，尚俟时其会。若夫十三经，则古圣先贤出诸口以传道授教，其重于石鼓文奚啻倍蓰哉！”很显然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重排重刻石鼓正是重刻十三经的前奏。

乾隆五十五年之后，未再见到乾隆为石鼓而写的诗文留下来。

五

在弘历看来，石鼓文是三代遗物，篆书之祖，其诗篇与《诗经》同体同时，讲的是周代礼乐，宣王中兴，理当视为文化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象征。乾隆所谓“千秋法物”“以寓兴文”即可由此理解。他对于石鼓文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在御制诗文中，从开始的“吾愿兴贤得真宝”（见《石鼓歌》），到后来的“近因阅石鼓文，惜其岁久漫漶所存不及半。夫以国学兴贤述古之为，使千万年之后并此仅存者胥归无何有之乡，有治世之责者视之而弗救，予且不成读书之人矣！斯事体大”。“非因难以见巧，实述古以传今”。（见《重排石鼓文序》）乾隆思想是前后衔接、逐步发展的。两千年前所刻，一千年前发现的石鼓在乾隆时代独出机杼，成为提倡“述古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

文”和珍重护惜文物的真宝与重器。

石鼓在乾隆之世的特别遭际已如上述。⁵

清初，顾炎武、朱彝尊的学术活动已经揭起了清代金石学的序幕，弘历会有所闻。然而弘历从即位初期组织翰林编撰《秘殿珠林》《石渠宝笈》以系统著录历代书画，传拓考证石鼓文奉为千秋法物，著录、图绘内府鼎彝铜器编成《西清古鉴》等一连串举动，无不具有古典考证学的性质。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，帝王的好恶影响朝野甚大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以石刻方面来说，至乾隆中期日见全盛，各地方访碑、搜集、编目、著录的普遍展开，保护金石的加强，实与乾隆的“兴贤述古”“述古传今”的倡导相呼应。朝廷自上而下的推动和朝野间互动的的作用，在清代古典考证学中是十分重要的原因。从《金石萃编》及其作者王昶即可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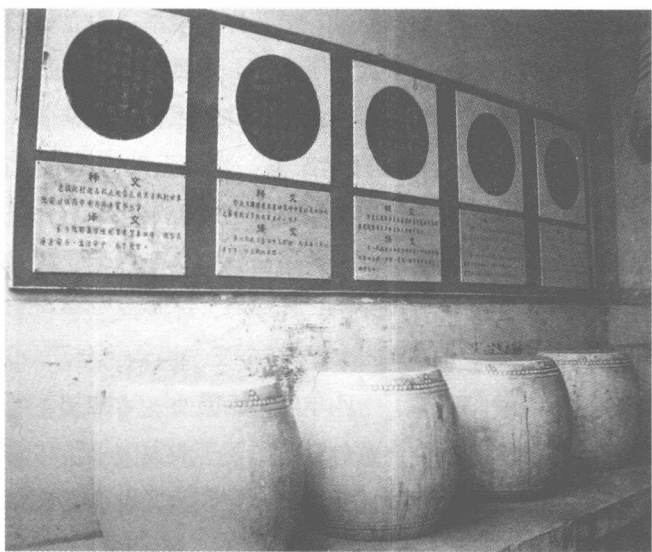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：国子监内乾隆重刻石鼓



图9：国子监内乾隆重刻石鼓庚鼓拓本

出倡导的影响。

王昶（1725—1806）乾隆十九年进士，官至刑部右侍郎，精于诗文、金石。嘉庆初编撰成《金石萃编》一百六十卷，为金石学经典著作。该书卷首列石鼓文。王昶在按语中说：石鼓“元明以来久列国学。乾隆五十五年，高宗纯皇帝临雍讲学，见石鼓原刻，惧其岁久漫漶，为立重栏以蔽风雨。别选贞石摹勒石鼓之文，俾海内士人便于椎拓。《御制重刻石鼓文序》从韩愈诗定为宣王时物。洋洋圣谟，昭示万古。臣昶仰蒙恩赉，得瞻全帙，诚熙世之隆规，艺林之盛事也。臣谨敬什袭藏诸家塾，爰以石鼓冠是书之首志荣遇焉”。按语讲“仰蒙恩赉，得瞻全帙”是指乾隆五十五年元月十五日后见到了《御制重刻石鼓文序》的墨迹全卷，“什袭藏诸家塾”是指朝廷将墨迹摹勒刻碑之后的拓本颁赐大臣，王昶得到了一份。此事当为乾隆推动金石学有力的一个明证。

文存石寿。自乾隆十四年至今又二百六十年了。石鼓的元代拓本已不知下落。然而岐阳石鼓、十四年所拓石鼓文、《御制重刻石鼓文序》墨迹及拓本都保存在故宫博物院，重刻石鼓仍置于北京国子监和承德文庙，王澐、汪由敦书石鼓文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它们共同见证了乾隆与石鼓的一段因缘。

注释：

1. 见《清高宗御制诗》第二集，木匣上并无《石鼓歌》之标题。
2. 蘅塘退士编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韩愈《石鼓歌》。
3. 载《石渠宝笈续编》第580页。
4. 近代学者认为石鼓是东周时的秦国刻石。
5. 参见侯怡利《圣主明君的形塑与文物的再诠释——论乾隆重刻石鼓》，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27卷第4期，2010年。